

## 安重根与中韩抗日爱国运动研讨会综述

1999年10月30日至3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和韩国安重根奖学会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安重根与中韩抗日爱国运动”学术研讨会。

在近现代东亚各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安重根是一位对中韩日三国都有影响的传奇人物。他组织义兵抗战并在中国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迄今已有90周年。举办以安重根为主题,讨论中韩两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大陆学界还是第一次。韩国学者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来自高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东西大学、汉阳大学等大学的1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汉城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为会议提交了论文。中国方面,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以及重庆等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及发言提纲40余篇。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韩国义士安重根当年在中国东北的英雄之举,并希望以史为鉴,弘扬其爱国主义精神和东亚和平思想,为增进中韩友谊和东亚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这次会议讨论的学术专题主要有:

### 一、关于安重根的生平、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问题

韩国安重根奖学会会长徐德根在他的发言及论文中认为,安重根为了韩国的自主独立和东亚和平,一举击毙伊藤博文,他的义举警醒了国内外人士,成为扩散抗日意识、促进独立运动的契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安重根被关押在旅顺监狱及

其英勇就义的一些情况作了考察。他认为,安重根主张亚洲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合则成功,散则失败”,共同抵御列强侵略的东洋和平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度;并指出,在韩中两国的民众心目中,安重根都是不朽的民族英雄。

尹庆老(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向会议提交了《思想家安重根的生活和活动》的论文。他认为,安重根是在接受文明开化思想后,产生民族意识和基督教思想,从而倡导义兵运动的;安重根的义兵论可分为民权义兵论和开化义兵论两种,与当时既存的基于对君主忠心的义兵论有本质的不同。崔起荣(韩国西江大学教授)探讨了安重根与天主教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虽然安重根的社会实践思想遭到天主教的反对,但在安重根思想深处仍对天主教矢志不渝。王键(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副研究员)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应首先强调安重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爱国在先,信仰在后。金正(韩国东西大学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系统评价了安重根的东洋和平思想。他认为,在安重根生活的时代,虽然东亚各国的实际地位并不一致,但他的“东洋和平论”思想首先是建立在中日韩三国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基础之上的。

韩诗俊(韩国檀国大学历史学科教授)利用中韩各自出版的有关书籍,比较分析了当时中国人的一些社会心理。安重根被当时的中国人称誉为“亚洲第一义侠”,他的英雄事迹在中国造成极大的影响,距其牺牲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革命党人就推翻了大清王朝。徐勇(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论安重根抗日活动的意义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认为,安重根的义举是超越于普通暗杀行动的抗日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以巨大鼓舞,而且提供了经验和教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当时的社会变革取向。

## 二、关于“三·一运动”及在中国各地的韩国独立运动

1919年韩国爆发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三·一”运动。

“三·一”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后,韩国独立运动的组织力量转移到中国,活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对这一时期韩国独立运动的活动情况,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多方位的探讨。北京大学教授宋成有对韩国“三·一”运动提出了新的评价。他认为,引发韩国“三·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外来影响并非俄国十月革命,而是巴黎和会的召开,是威尔逊“十四点纲领”中的民族自决主张。关于运动中33位民族代表的表现问题,他认为以往“很快就投降了”的说法既过于笼统,也不符合事实。在“三·一”运动的定性问题上,传统的“‘三·一’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终结的标志”的提法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赵建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乐敏(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指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创建和发展,在海内外造成相当的影响,为韩国独立运动的继续发展和临时政府日后领导韩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李恭忠(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徐万民(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会议提交了《朴容万在北京:20年代韩国独立运动的另一个侧面》的论文,他们从朴容万这个曾长期被冠以“卖国贼”罪名的人物的复杂经历入手,指出,朴容万坐守北京一地,对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缺乏全面的把握,只能随着北京地区实力派的更替而不断改变自己的依靠对象,这不仅导致他与上海临时政府的对立,也直接招致被杀身亡的命运悲剧。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长期在华从事反日复国的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绝后的独立更生的时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其他一些在华的韩国主要党派团体相继迁至中国战时陪都重庆。杨光彦(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潘洵(西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考察了韩国独立运动在重庆活动期间建立统一战线、武装力量以及争取战后独立地位和国际承认等三方面的情况。指出,七

七事变以后,抗日复国的韩国独立运动由于在重庆获得了公开而安全的环境,并得到国民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与援助,使自身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任椿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探讨了在抗战期间被称为“延安派”的韩人组建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和朝鲜独立同盟,及其在抗战胜利后回国以“朝鲜新民党”名义组建政党,参加朝鲜半岛南北政坛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朝鲜新民党在政治活动中坚持主张新民主主义论和联合政府论,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战而且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事实。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各地抗战活动的比较,不少学者认为,南、北朝鲜的志士在抗战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提“大韩民族”在抗战中的功绩更符合历史实际。

### 三、关于历史遗留问题

米庆余(南开大学历史所教授)考察了日本明治初年筹谋吞并琉球王国的始末。他指出,明治维新政府虽然为占有琉球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但是琉球在历史上形成的“日清两属”观念在当时并无多少改变,日本当局的吞并企图也受到琉球王国的抵制。吴天颖(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论证了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历史事实,并对19世纪后期日本图谋、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作出全面细致的考察,驳斥了日本一些人的强辩妄说。徐德根和刘明珠(韩国汉阳大学行政学科)对日本当年公布的占领独岛告示的法律依据是否合理的问题进行了详实论证后认为,1905年独岛被划归日本时韩国未做出抵抗行动,只不过是屈服于日本殖民当局征服和压制的结果。又进一步指出,想用所谓法律依据使侵略行为合理化的行为应视为是对国际法的无知。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成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分别就慰安妇和细菌战问题对日军罪行进行揭露。

会上,还放映了由冯开文(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长)提供的有关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活动的专题片。

(王硕)

## “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综述

1999年11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主办的“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学者、细菌战受害地代表约60余人出席了会议。

浙江省义乌、丽水、衢州、江山及湖南常德、云南保山等地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日军细菌战调查情况。这些调查表明,日军细菌战造成了广大地域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如浙江省全境都受到危害,伤亡数十人至数百人以上的村庄不在少数;云南保山县一次死于霍乱的就达6万人;湖南常德死于鼠疫的经核实已有3000人。这些新的调查数据,都远远超出文献中记录,而目前的调查还仅仅是处在起步阶段。

与会者认为,日军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惨无人道,危害延续至今,是严重的战争犯罪。但由于日军在战时实施细菌战极其诡密;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出于冷战的需要,掩盖了日军这一严重的战争犯罪,使细菌战危害中国的真实情况鲜为人知。从80年代开始,日本有识之士和中国受害地区群众开始做民间调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会者指出,日本政府至今未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并继续隐瞒有关材料,曾庇护日军细菌战犯的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也态度暧昧,另外,随着时光的推移,受害幸存者日渐稀少,这些都